

顧維鈞回憶錄

第七分冊

中華書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丛刊

顾维钧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第七分册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9096 - 3

I. 顾… II. 中… III. 顾维钧(1888 ~ 1985) - 回忆录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0988 号

-
- | | |
|-------|--|
| 书 名 | 顾维钧回忆录(全十三册) |
| 译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 丛 书 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
| 责任编辑 | 李 静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8 $\frac{3}{4}$ 插页 69 字数 800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096 - 3 |
| 定 价 | 990.00 元 |
-

目 录

第七分册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上(1946—1950)

第九章 紧要关头

1949年1月—10月	3
-------------------	---

第一节 中国的局势及分析

1949年1月—3月	3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国政局动荡和

可能组织联合政府的反应(一)

1949年1月中—2月中	20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政局动荡和

可能组织联合政府的反应(二)

1949年2月中—4月中	45
--------------------	----

第四节 战事复起后,为寻求一项建设性

政策所作的努力

1949年4月中—6月末	81
--------------------	----

第五节 面临分裂之际,对建设性策略的探索

1949年6月中—8月末	154
--------------------	-----

第六节 白皮书发表后要求继续援助

1949年7月中—8月	195
-------------------	-----

第七节 从区域性条约看当时的国际阵营

1949年1月—10月	236
-------------------	-----

第八节 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情况	
1949 年 8 月初—9 月	309
第十章 大陆失守	
1949 年 9 月—1950 年 6 月	376
第一节 承认问题和中国向联合国控诉	
1949 年 9 月—1950 年 1 月中	376
第二节 政府自广州撤至台湾	
1949 年 10 月 1 日—12 月 8 日	437
第三节 对台湾及海南岛的援助问题	
1949 年 12 月 9 日—1950 年 3 月 7 日	489
一、援华法案的延长	
1949 年 12 月 9 日—1950 年 2 月 15 日	489
二、美国的援助和中国的总统职位之争	
1950 年 2 月 15 日—3 月 7 日	541
第四节 大陆失守,中国的局势及由此而产生的若干问题	
1949 年 9 月—1950 年 6 月	566
一、大陆失守的原因及失守后出现的局势	
1949 年 12 月—1950 年 6 月	566
二、大陆失守造成的困难	
1949 年 9 月—1950 年 6 月	584
三、在联合国遇到的麻烦	
1950 年 2 月—6 月	628
第五节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美援情况	
1950 年 2 月中—6 月	648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

上

(1946—1950)

第九章 紧要关头

1949年1月—10月

第一节 中国的局势及分析

1949年1月—3月

1949年1月8日,中国政府向美国、英国、法国及苏联发出照会,要求调解对共产党的战争以实现和平谈判。外交部1月14日来电说,美国已于13日复照拒绝。电中又说,美国似乎不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调解。很自然,也没有别国愿意出面调停。英国已于1月12日宣布其拒绝调停的决定。俄国拒绝调解的答复则于1月17日送交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法国的反应也是同样不佳。

同时,由蒋委员长在新年致词和孙科的声明中确定的政府和谈条件已被1月14日共产党广播的八项条件驳回。其中包括惩办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四十五人和废除蒋委员长所提条件中要保存的1946年宪法。在军事方面,共产党继续取得胜利:天津于1月15日陷落;北平被包围,傅作义将军正在谈判投降条件。

我在和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谈话时曾部分地综述了当时的形势。他当时正在华盛顿和美国政府商讨北大西洋公约。在前几天由新西兰驻华盛顿大使卡尔·贝伦德森举行的招待会上,弗雷泽对我说他将在三两天之内离开华盛顿,希望在行前和

我好好地谈一次。我们约好1月16日在新西兰大使馆会面。见面时,我们互道会面畅谈的欣悦心情。然后就中国局势进行了商讨。

弗雷泽说他很同情中国,并问中国的局势如何。

我告诉他,军事情况很紧急,政府决心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政府正在考虑共方为答复蒋总统新年文告和孙科声明中所述条件而提出的八项条件。天津已经失守,共产党目前正对北平施加压力。在华中,政府军已放弃蚌埠以便把防线缩短到长江北岸。但政府顺应人民一致的愿望而诚意求和之举,反而影响了前线武装部队的斗志,因而形势更加复杂化了。

弗雷泽问我,美国政府对这种局势有何看法,以及我对从美国取得大量援助是否寄予希望。

我告诉他说,看来美国政府正在推行一种在决定采取积极政策之前先观察等待的方针。他们甚至不肯发表一个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更不要说增加对华援助了。

弗雷泽着重指出,他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军几乎完全失去斗志,并问对此打算怎么办。

我回答说,南京曾表示过它非常希望美国派一个由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到中国去,他们的任务不是去为我们作战,而是帮助我们计划和改组。单是指派这样一个代表团本身就能在中国与共产党的斗争中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这位总理又问,美国政府究竟希望看到在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说近两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中国政府出现他们所谓的重大变化。虽说不仅现政府的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前此的政府也已大部由无党派人士和各党派以及国民党的成员组成,但看来并未能满足美国政府对改革的希望。我得到的印象是一旦蒋委员长决定下台,美国人决不会为他洒一滴眼泪,虽说美国人从未正式地向我说过如此的话。弗雷泽问是否还有其他的领袖

人物可以领导对共产党继续作斗争的运动。我回答说,在中国威望很重要,现在很难找到一个享有像蒋介石那样威望的其他领袖人物。

弗雷泽又问有什么办法能够挽回中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他似乎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他不了解中国政府做了哪些事来改进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例如构成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

我说,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虽说“民生”提在最后,可是目前“民族”和“民权”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民生”实在是最重要的了。政府也曾致力于实现土地改革和提高农村福利的计划。不过中国很大,又从事着一场全面展开的战争,政府未能如愿实行。

弗雷泽认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在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只凭军事力量是抵挡不了共产主义的。人民必须能活下去。他问我对在中国阻止共产主义的前景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说,我的意见是,第一步要联合全国的反共力量,守住长江,改组各省的军队并等待国外进一步的援助。当弗雷泽问我中国政府能不能守住长江以南地区时,我说长江有一至二英里宽,仍是一道天堑。在有力的空军巡逻之下,共产党要派遣大部队过江是很不容易的。

1月18日贝祖贻来访。我问他有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先是免职,接着辞职、然后又批准他病假的经过。贝祖贻说,财政部长徐堪是俞的死对头,对俞鸿钧草率从事兑换黄金以致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深为不满,因此设法通过行政院将俞免职。不过当蒋委员长知悉以后(事先没有向他请示过),他却批准俞氏病假。*

* 原注:此项兑换黄金以致死七人伤多人之事件似发生于1948年12月23日。根据1949年1月3日出版的《中国经济》4卷1期第4页:“12月23日估计有不下十万人上海的各国家银行挤兑黄金,造成极大混乱”……结果造成“七人死亡,一百零五人受伤”。

实际上,俞鸿钧处理政府黄金库存和公开兑换之事的背后存在着一段极富政治性的复杂经过。作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控制着政府的黄金储备不受财政部支配。按照蒋委员长的直接命令,他开始秘密地把库存黄金运往台湾,没有通知政府或财政部。由于此事必须秘密进行,他们在伪装下用海军舰艇装运这些黄金。但不幸的是,事情被泄漏了出去。

我曾一度听施纪元说过这段故事,当时他是中央银行主管金元券的那个处的处长。我在1970年6月19日又曾找他进行了核对。他说第一次从中央银行把黄金储备运往台湾的命令大约是在1948年12月上旬下达的。当时蒋委员长已经离开南京,以使李宗仁将军能便宜行事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从外滩中央银行搬出黄金是在半夜秘密进行的。从银行到等待装运的军舰停靠码头之间的一段马路划为禁区,临时戒严。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字林西报》(办公室也在外滩)的英国职员在酒足饭饱之后醉醺醺地踉跄而至,闯入禁区,要回办公室上夜班。他看到他的办公室所在地段警备森严的可怖景象而大感惊异,当然他打听出了这项秘密并在第二天早晨的该报上刊登出来。

此事在上海造成极大的不安和抗议。抗议不仅来自民间的商会和银行,也来自专为防御共军的任何可能进攻而驻扎在京沪地区的部队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他在上海大肆抨击说运走黄金只会降低他麾下部队的士气。黄金从上海运走表明政府不打算坚守此地,怎能指望他的部队为此作战。因此,为了平息上海公众的抗议和纷扰,俞鸿钧只好说这笔黄金是准备公开兑换的。就这样,当市民群众蜂拥挤兑之际(黄金兑换官价大大低于黑市金价),造成多人被践踏致死的意外事故。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俞鸿钧病假免职的内情。它反映在远离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府统治区正在形成三个分别的当局,从三处发号施令。

1月19日孙科在南京宣称,行政院决议,要求共产党无条件

停火并立即进行和谈。1月21日上午十点,美联社自费尔法克斯电台广播说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由副总统李宗仁接任。中文的“引退”与“辞职”并非一回事,他仅是要求副总统接着干下去而已。下午三时,无线电广播说蒋委员长在南京时间(下午)四点钟或华盛顿时间上午六时乘飞机离开南京“退隐”。该报道说,他已飞到杭州并换汽车驰往奉化老家,在去台湾之前将在那里住几天。报道还说宋子文已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又说他将到华盛顿来接替我。不过我不大相信此说。

第二天的新闻报道说傅作义将军已签了一项保全面子的十三条协议,不流血地将北平交给共产党。此项报道还说,南京方面急于和谈,已经放弃了要求共产党在谈判前先发停火命令的条件,而打算即使冲突不停也立即进行谈判,地点和时间另商。但迄今尚未得到共方的响应。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很清楚,即南京方面已完全丧失斗志,几乎是在乞求和平。随着蒋总统的引退,他的支持者已将首都交给主和派掌管。

1月24日外交部长吴铁城来电要我核实他所接到的一封报告,并且通知我他想辞职。我在回电中劝他等待时局的发展。26日他发来另一封电报。该电与外交部1月14日来电相似,告诉我政府决定迁都到广州,2月5日起政府正式在该地办公。显然政府已断定,如果和谈失败(这是很有可能的),南京,甚至长江以南诸省都难守住。

也是在26日(我是事后知道的),李宗仁为了能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发布了释放政治犯,解散各地的戡乱指挥部及其他类似措施的若干法令,以表示进行和谈的诚意。27日他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大约与此同时,派出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与共产党商谈。

据我所知,就是李宗仁在这方面的活动造成他和孙科之间的破裂,导致孙科与其行政院的主体迁往广州,而李则以代总统身份留在南京。不过李、孙不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48年竞选副

总统时或甚至更早。表面看来,孙科也主和,但不愿像李宗仁那样急于求和。这可能因为李宗仁感到他被置于取得和平解决和防守长江两大难题之上,同时库存黄金储备和美援军事物资既已运往台湾,共产党又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之下,充满信心,坚持其类似无条件投降的八项条件不让;他也觉得别无他途。不论如何,到1949年2月10日,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的经常话题已转向李宗仁总统和孙科内阁的分裂上。尽管两方都正式否认此事,但报刊还是继续如此报道。当时局势很混乱。就像我的武官皮宗敢所说,他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毫无所知;又如毛邦初,则连当时国防部的下落也无从得知。他既不了解国防部是在南京、广州抑或是在其他地方,也不清楚谁在当国防部长。徐永昌还是部长吗?张发奎是否当了国防部的参谋总长?

蒋委员长当时仍在奉化,通过他的秘书答复我的电报,表明他不愿让别人看来他仍对国家政治关心。其实我从他在电报中流露的心情——例如他慰勉我的努力和因为我的责任加重,要我保重身体等等——看得出他仍旧很注意中国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具有类似感受的毛邦初,在2月10日向我汇报说,他曾与在奉化的蒋委员长通了电报,蒋来电勉励他要继续在美国供职,因为责任重大。

2月21日,我听到国民党的元老之一、考试院长戴季陶和早些时候在南京自杀的陈布雷一样,因为对时局感到绝望在广州自杀的消息。3月1日我出席韩国大使馆庆祝独立革命的招待会,招待会上见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海军上将索尔斯。他秘密告诉我,委员会头一天接到关于中国军舰重庆号去向的情报。那天的另一情报说,重庆号已投向共产党。他抱歉地说,该舰一被发现将立即予以击沉,以免被共产党使用。我说这真使我吃惊,我不能理解共产党为什么急于要这条军舰。也许它能帮助共军主力渡过长江。

3月7日据报有消息说孙科辞职。3月8日早晨无线电新闻

广播宣称孙科及其内阁辞职。孙科是到立法院作三个月来的施政报告时宣布辞职的。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报刊评论,把孙科的辞职说成是李宗仁及其与共产党和谈努力的胜利。

于斌大主教那天在大使馆出席一次会议,提到来自中国某些方面的压力,要求政府今后拒绝接受美援,因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他还说,上海的和平代表团从北方回沪后发表的报告故作乐观以安定人心。但是李宗仁总统的私人代表已从共方带回三项严厉的条件:第一条是反对及消除英、美影响;第二条是撤换全部反动军官;第三条是向共产党交出南京、九江和汉口。于斌相信孙科的突然辞职起因于他不同意这三项条件。

只过了三天,李宗仁副总统要求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12日立法院投票通过何应钦的新内阁。叶公超任代理外交部长,新任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3月21日晚宣布新内阁正式成立,我注意到除了个别例外,新阁是由较年轻的成员组成,这些人都是公认的各界领袖。

3月18日,报载监察院对孙科提出弹劾,说他盗用公款美金二百五十万元。据说他通过财政部长徐堪下令由中央银行将这笔巨款拨入他的儿子孙继平户下,并马上分别存入上海若干钱庄。此消息令人抑郁。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道此中有多少真实性,也许又是一桩政治诬陷,或是对他的政治报复。

我通常对这类没有证据的新闻报道是不予重视的。不过我能看出,在美国公众舆论如此激动而报纸上又充满了盗用公款的报道之际,这条新闻对一位为美国公众所熟悉的人说来,势将造成很大的损害。

第二天的报纸消息同样令人沮丧。据报道,共产党部队正向南京移动;而在首都,为了重行开战的军事准备也正在紧张进行。当时我在日记中写了这几行:

局势是可悲的。它说明过去多年我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有某些错误。忽略了在治理国家中应当注意人民意愿的原则,以致损害了中国。中国古训“民为邦本”,意义至深。按现代的意义说,人民是国家的股东,政府不过是董事会。董事会不可能一直违反股东的利益进行经营而不遭到股东的怀疑,失去他们的支持,以致引起抗议和反对。

3月20日我又加上这些想法:

回顾中国的苦难局势,目前较之过去更为明确,即人治政府不论其心地如何善良,永远不如法治政府为理想。法治是建立国家的巩固基础。人治不可能摆脱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的影响。

3月23日,我从收音机听到共产党的广播,再一次攻击李宗仁总统和何应钦为“伪政权”。不过,大约与此同时,共方宣称将于4月1日起参加和谈。随后,紧接着政府宣布它的和谈代表团之后(就我所知是3月24日宣布的)^①,共方也指派了一个正式的和谈代表团。

在这段时期中,连续不断的大批访问者人流从中国来到美国。首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成为西方集团中最强大的国家,每个关心国际问题的人由于各种原因,自然都要来访美国。其次,中国迅速崩溃的局面,使人们要为其前途着想,最好是能设法在国外谋一出路。这是中国有钱有势的人们的普遍想法,尤其是在国外的外交人员,更因使人失望和动荡的中国局势而感到不安。

我前已提及刘锴和郑宝南在驻巴黎联合国中国代表团任职

^① 据新华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558页,此事是3月26日宣布的。——译注

时曾向我国驻欧外交人员讲过的话和他们的印象。联合国副秘书长胡世泽于1949年1月17日来访,他刚刚因公旅行回来,也向我提及中国驻欧外交代表团的焦虑,即一旦在南京成立一个共产党的或联合政府时他们能做和应做些什么。如果国内的政府召他们回国时,他们是否应当回国述职?他告诉我,驻比大使金问泗无论如何决不回国。但是驻欧外交人员主要担心的是,一旦他们去职,将何以为生?据他说有的人想在美国兴办一个联合农场。我对胡说,我也以此问题为虑,我还要很好研究一下才能给他确切的回答。

另一个可以说明国内许多身居要职的人由于大陆形势而感不安的例子是光华大学校长朱经农的访美。当他1月25日第二次来访问我时,据说他由于看到国内局势恶化如此迅速,已决定不回国,并希望能在某个美国大学校中谋一教席。

大多数的访美人员是非官方身份,我猜想可能是私人出的旅费,不过我不甚清楚。有些访美人员则是用的政府名义,多数是以考察研究为目的,研究与他的专业有关的方面(例如朱经农就是来美国考察教育的)。不过这些“研究”访问,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是非官方的。

不管这些人的访问性质如何,凡是来华盛顿的,大多数都要到大使馆来访问。我和这些访美的中国人交谈,和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客人们交谈,以及和那些与大使馆或其他中国政府驻美机构有往来的人交谈,都使我能从另外的角度透视中国的近况。

朱经农第一次来访是1949年1月10日。我问起有关中国局势的最新消息。他说几个月前他就观察到中国士兵们士气低落和军官们缺乏斗志。前者由于吃不饱和共产党的宣传,后者由于贪图安逸享受。朱先生说他曾将他所见到的中国军队的状况写信告诉陈诚,但是回信只是一篇敷衍的空话而已。没有一个人敢把真相告诉蒋委员长。如果有人真敢这样做,他马上要为其他人所嫉视而被孤立。所以蒋委员长就被蒙在鼓里,只听到顺耳的话

和从军队的下属那里收到顺心的报告。

早些时在 1948 年 11 月 5 日,我和一位与国务院有联系的熟识的美籍华人交谈。他告诉我,他最近在沈阳、北平、天津和锦州时,看到中国军队士气低落。11 月 9 日,农林部次长谢澄平和夫人一起来拜望时,也评论了军队士气。他是 1945 年代表中国青年党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李璜的私人秘书。这次是刚刚抵美来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的年会。由于他刚从中国来,所以我急于了解他对那里局势的看法。

他说国内的军事形势不很乐观。他看到军队士气低落和指挥官怯懦无能。他说军队系被留作保卫城市而不是派往前方积极从事作战。他认为蒋委员长已经不能掌握局势。有一次在行政院,何应钦将军被召去报告前线状况(当时何任翁文灏内阁国防部长),何请求谅解说,只有蒋委员长直接指挥战事,他并不知悉情况。谢还说,有一回蒋委员长听说国民党的进步派中酝酿着反对意见。他召见了其中的三十二人。他要求不同意他的劝诫(肯定在此以前他已作了训话)的人站起来。其中十七人真的站了起来,狠狠地触犯了他。委员长气坏了,戴上帽子愤愤而去。之后,他家里的人设法把他弄到无锡去散心,而报上却报道说蒋是因避寿而去的,云云。

谢次长又说,另一次一批约七十个国民党、三青团和黄埔系的少壮派求见蒋委员长。他们的请求被批准了。他们向蒋呈上一组建议,包括要在政府里用较年轻的人换下较年长的人;要他放弃一部分权力;以及给予内阁更大权限等。蒋委员长又被激怒了,他要另一部分人陈述意见。这部分人也说了同样的话,还补充说,他们可能被砍头,但是为了负责,也必须坦率陈词。蒋委员长大怒,一句话也不再说,马上走了。

杨继曾将军在回国前夕曾来辞行,对我阐述了中国军队的真相和贪污积习。我很重视他的说明,因为我觉得他很能干、诚实、热心,不嫉妒旁人。他提到了由于司令官们惯于虚报人数,以致